

II • 邂逅人類學但心繫藝術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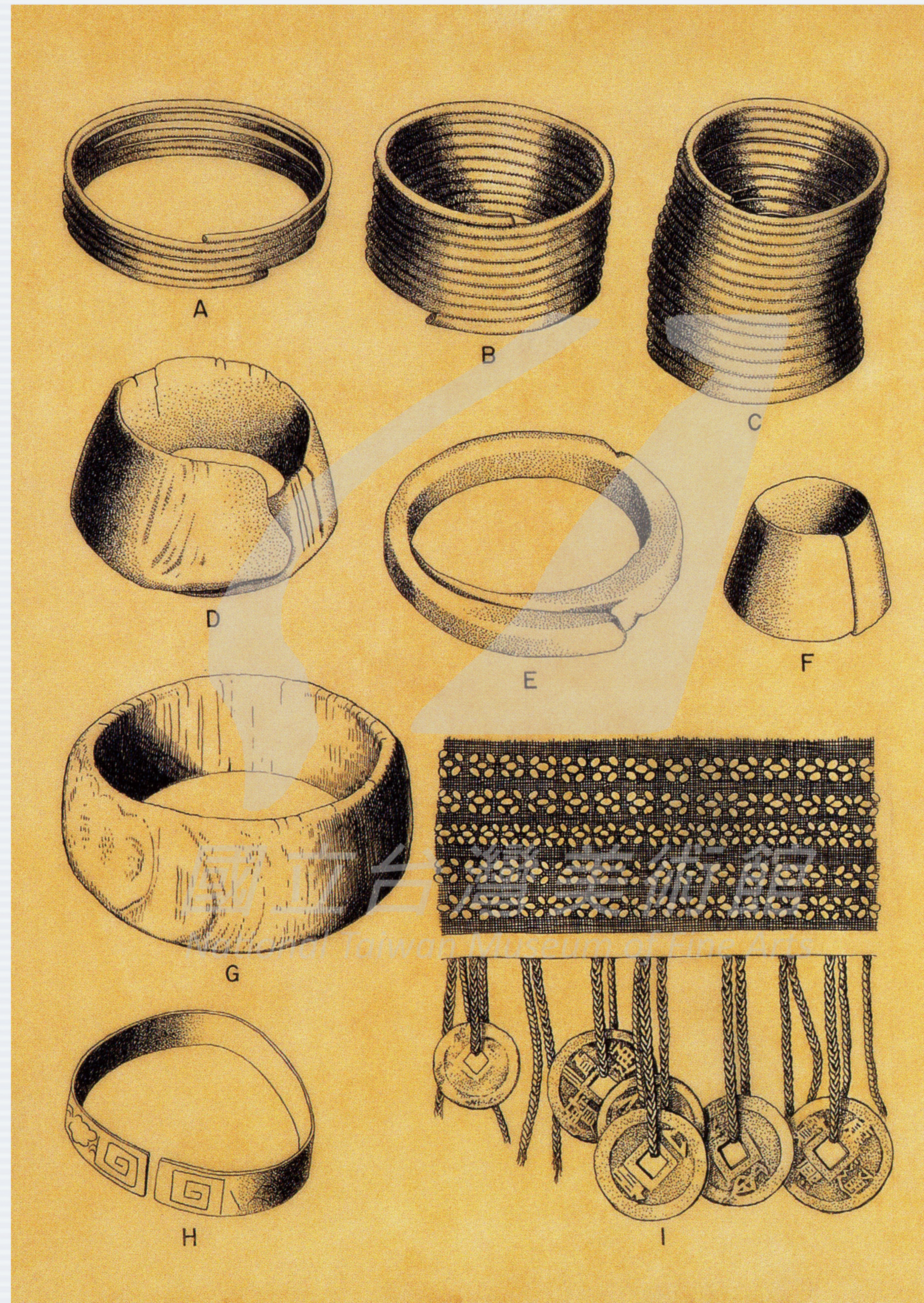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一生可以說是很多的偶然造成的，往往刻意想做什麼反而做不成，譬如我想進臺大政治系，不成；少年時也曾想過當音樂家和畫家，後來在父親的勸阻下，也不成。如今回想起來，如果當時我進了省政府，可能就是從基層的一個小科員做起，之後會如何，完全沒把握，但可確知的，一定不會是現在的我。我二十五歲以後的人生，可以說進入《公論報》是一個契機。

——摘自《澄懷觀道——陳奇祿先生訪談錄》



〔右圖〕
陳奇祿攝於文建會辦公室

〔右頁圖〕
陳奇祿 阿美族的裝飾品
素描、紙本 32.5×25cm
A-C黃銅線手鐲，
D-E貝製手鐲，F青銅手鐲，
G象牙手鐲，H黃銅手鐲，
I附有康熙通寶的腰飾。



柳暗花明的謀事經驗

1948年4月陳奇祿懷著無比信心回到臺灣，一心想貢獻所學做個教員，這個願望他不曾想到會有阻礙。初生之犢不畏虎的他，獨自一個人去找臺灣大學政治系系主任，雖然和系主任相談甚歡，可是等了好些日子，就是得不到臺大教職的聘書。進臺大的希望看來是無比地渺茫，無奈只好拿著許世英（1873-1964，曾任中華民國國務總理）寫的介紹信，想到省政府謀職，結果也是事與願違。當時其父陳鵬對學術界也不熟，正巧見到雲林縣籍李萬居先生，他們把謀職的事說了，李萬居哈哈大笑說：「你這個會中文又會講中國話的臺灣人去省政府做什麼？還是到我那裡去吧。」所謂到他那裡，就是去他的民營的《公論報》任編輯，負責國際版。另外也主持副刊《臺灣風土》的編務，一切從頭學起，謀職

的事暫時獲得解決，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。

陳奇祿雖然接下這一工作，卻對臺灣的民俗很陌生，李萬居就介紹他去找藍蔭鼎（1903-1979）、楊雲萍（1906-2000）和陳紹馨（1906-1966）等先生寫稿。藍蔭鼎是福建漳州人，世居羅東，日治的公學校畢業後，他的畫作即博得盛名，也受到日本水彩畫家的賞識。他年輕時一度在山地行政課任職，所以也描寫過原住民題材。楊雲萍是位詩人和史學家；當時楊雲萍擔任臺灣省編譯館的編撰工作，成員包括臺北帝大的語言學教授淺井惠倫（1894-1969）、臺灣先史學的國分直一和《民俗臺灣》編輯池田敏雄（1923-1974）等人。由於這樣的關係，陳奇祿就認識了許多研究臺灣史的學者，無形中踏入臺灣研究的領域。

1948年，當時日人立石鐵臣正在為《臺灣風

關鍵字

國分直一（Kokubu Naichi, 1908-2005）

國分直一，出生於日本京都港區，畢業於日本京都大學史學系，師承鹿野忠雄、金關丈夫，1933年抵臺，除教學外，從事考古、漢文化、民俗、平埔族文化的研究。戰後被臺大文學院歷史系留用，直至三年期滿返回日本。是臺灣考古學第一代學者，受鹿野忠雄等學者影響，以歷史學、民族學、民俗學、考古學等不同方向從事區域性的研究，自臺南擴及全臺灣。對臺灣文化史研究有深遠的影響。



國分直一（右2）與陳奇祿（左2）等人合影，1999年在臺參加西拉雅族阿立祖祭。

關鍵字

立石鐵臣（Tateishi Tetsuomi, 1905-1980）



立石鐵臣本籍日本，日治時期出生於臺北東門街。知名畫家，臺陽美術協會發起人之一。他的父親立石義雄為臺灣總督府事務官，所以他在臺北出生。1912年返回日本讀小學，其後入學川端美術學校，受業於梅原龍三郎和岸田劉生之門下，故其畫風兼具寫實和寫意的風格。

1934-1939年間曾數度來臺，積極製作版畫並繪製標本插圖。後被徵召入伍，服役於花蓮。戰後為民俗臺灣的《臺灣原住民族工藝圖譜》繪製插圖，1948年為臺灣省博覽會繪製「臺灣史前時代人生活復原圖」，臺灣本土味極濃厚；其後短暫任臺大講師，聘期三年期滿於1948年底回日本，1962年出版《臺灣畫冊》，甚得好評。

左圖

立石鐵臣於1948年為《臺灣風土》繪製原住民工藝圖譜

下圖

立石鐵臣 《臺灣畫冊》排灣族的 木梳子、帽子 1962 水彩畫



土》的「臺灣原住民族工藝圖譜」專欄繪製插圖；到了10月，立石鐵臣與國分直一又共同繪製臺灣省博覽會的〈臺灣史前時代人生活復原圖〉，接著12月就返回日本。立石鐵臣返回日本後，原來畫插畫的工作沒人要接替，陳奇祿沒辦法就以「陳麒」為筆名，接下這個繪製工藝圖譜的插圖工作，這時他的素描專長第一次派上用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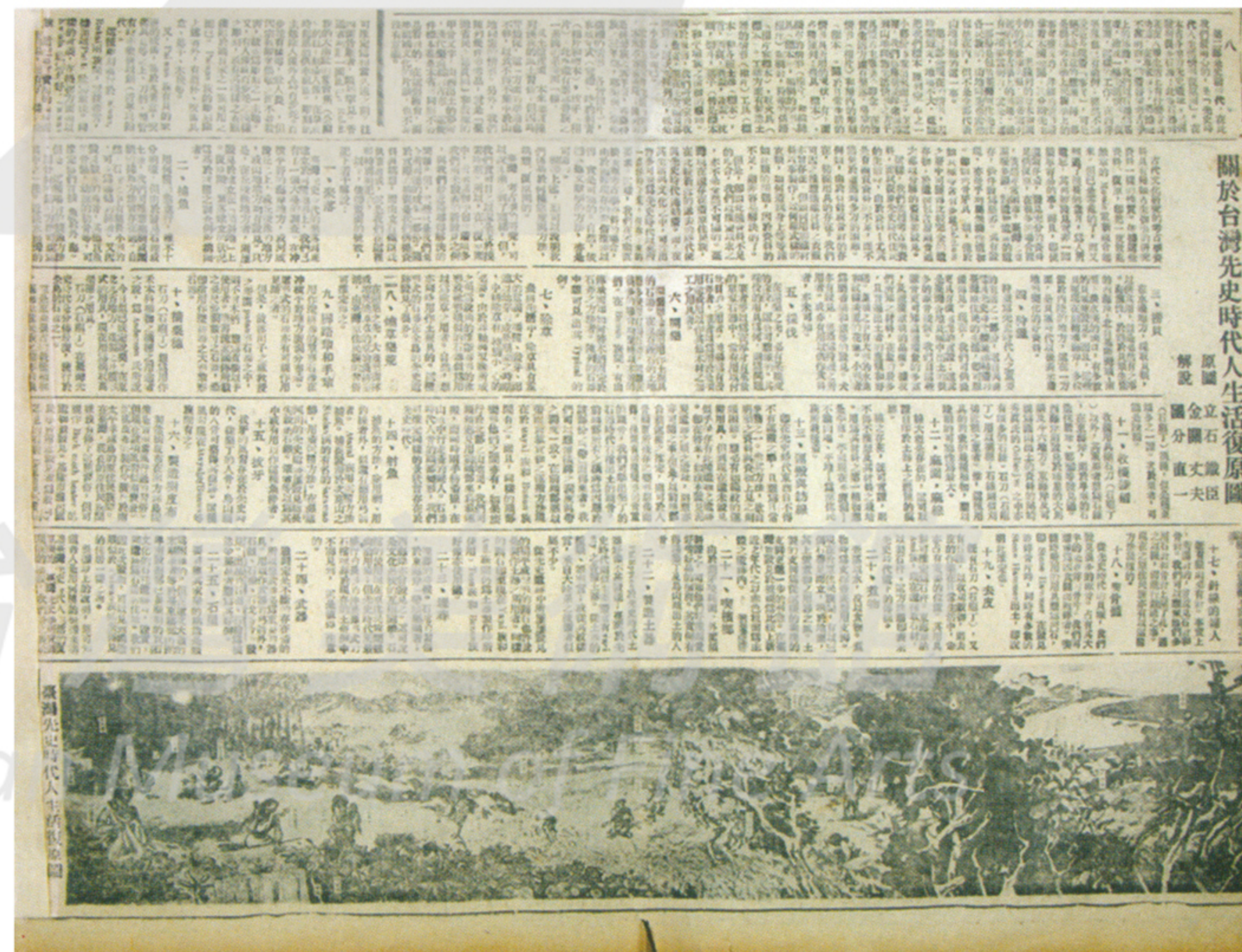
《臺灣風土》的另一位作者，就是以筆名「金關生」的日人金關丈

中圖

「關於臺灣史前時代人生活復原圖」刊登於《公論報》。

下圖

立石鐵臣 臺灣史前時代人生活復原圖 1948





陳奇祿（左2）與金關丈夫伉儷（右2、右3）攝於臺北。

【左圖】金關丈夫「民藝解說」專欄介紹竹椅子。（《民俗臺灣》，1941年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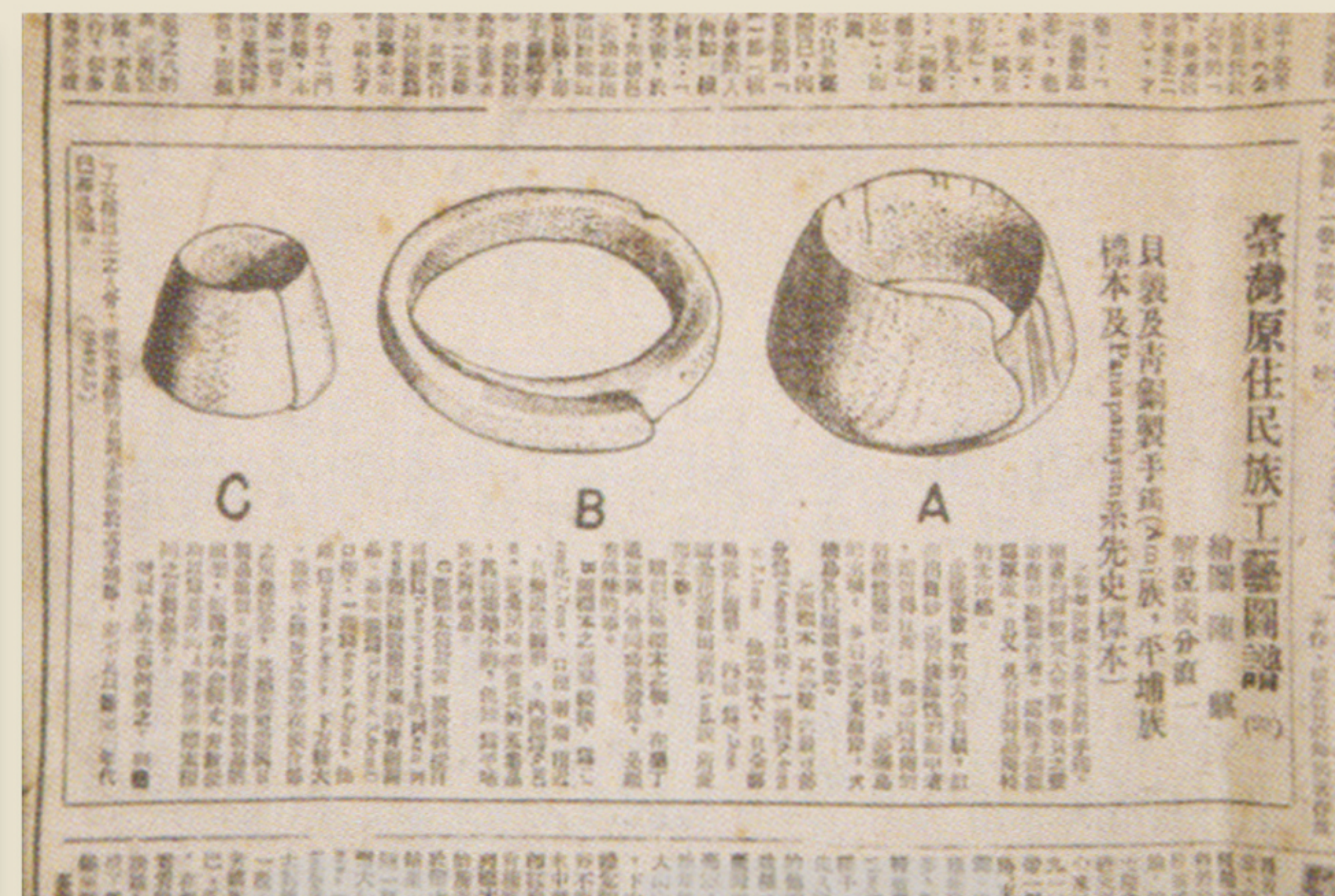
【右圖】金關丈夫（1897-1983）相片（南天書局提供）



夫（1897-1983），也是經由陳紹馨介紹認識的，之後陳奇祿不但和金關丈夫交往密切，他還促成陳奇祿與張若女士的婚姻。當時金關丈夫不但是解剖學、考古學教授，還是頗富盛名的美術鑑定家和民間藝術研究先驅。雖然金關丈夫不是畫家，但他畫人骨都描繪得異常精細，這個特例對陳奇祿很具有啟發性和影響力。

由於編務工作不但要寫稿、看稿、還要負責催稿和耐心地等稿，常常要奔波於臺大和《公論報》之間，可說是非常忙碌。最初陳奇祿並不認識曾經是臺陽畫會創始人之一、大名鼎鼎的立石鐵臣，陳奇祿看這位比自己大十八歲的前輩，他對臺灣民俗題材所表達的濃厚本土味，既特殊又具風格，自然崇敬有加。

陳奇祿在臺大等稿時，就利用時間去看陳列室的標本，他不是看看就罷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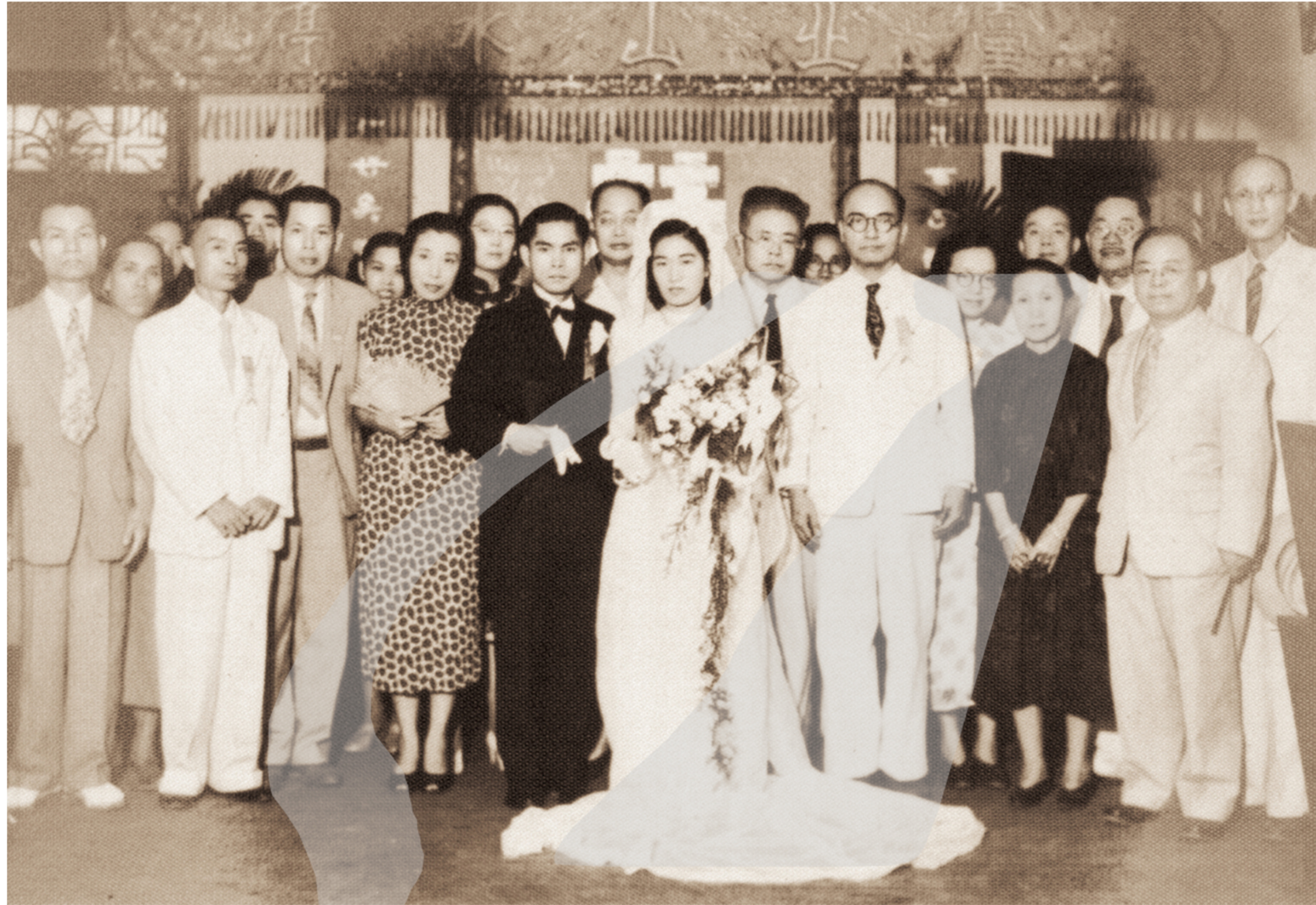


【右頁圖】陳奇祿（即陳麒）發表在《公論報》上的「臺灣原住民族工藝圖譜」專欄插圖。

還把感想寫成一篇〈土俗研究在臺灣〉的文章，刊登在《臺灣風土》裡，這是專門介紹這批民族學標本陳列室的文章，筆名「彬」的作者就是陳奇祿。這篇報導無形中開啟他走入臺灣原住民研究的道路。後來由於《臺灣風土》形成了一定的風格，除了臺大教授以外的許多文化人，都樂於在臺灣研究的題材下寫稿，於是也開拓了臺灣研究多個面向。

從《公論報》編輯到臺大教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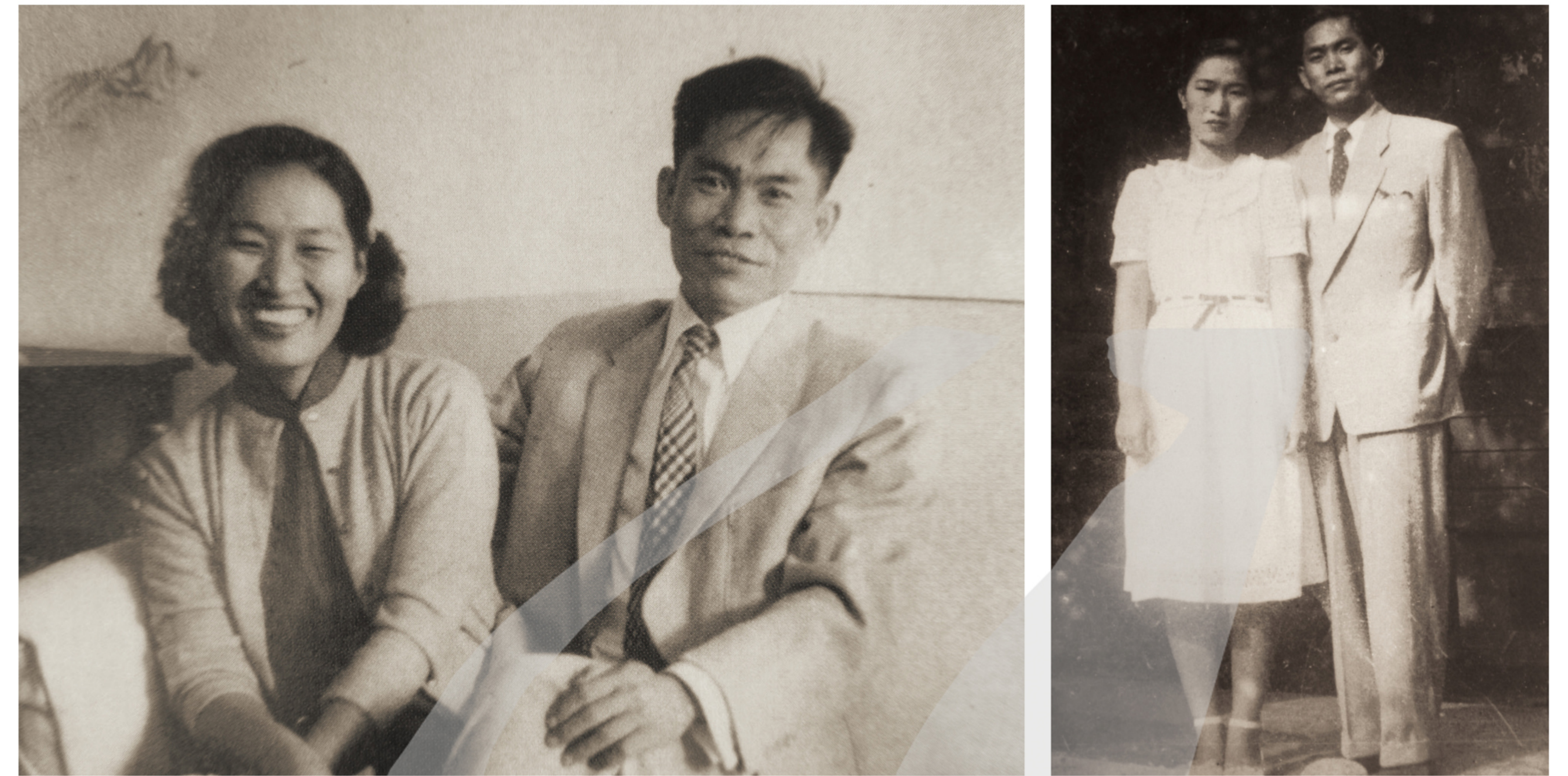
1948年底，當初留任臺北帝大，後為臺大延聘三年的日本籍教授紛紛返日，管理民族學標本的宮本延人（1901-1987）也是其中之一。為了接下管理標本的任務，傅斯年校長於是徵詢陳紹馨教授的意見，陳教授



陳奇祿於1949年與張若女士的結婚照。攝於臺北山水亭，後排右2為張山鐘，前排在2為陳奇祿父親，父親身後為母親，傅斯年及其夫人站於新娘及新郎旁。

又去徵詢金關丈夫的意見，金關丈夫毫不猶豫地立即推薦陳奇祿擔任這項工作，因為再也沒有人比陳奇祿對標本更熟悉的了，當即獲得校長傅斯年的同意。於是陳奇祿順理成章地從《公論報》編輯被聘請進入臺大，職位是歷史系的助教。

其實在這之前，金關丈夫正計畫促成陳奇祿和張若女士的婚姻。金關丈夫長期從事體質人類學的研究，和臺灣許多醫生都熟悉；他也常遠到屏東縣萬丹鄉，品嚐超好吃的「紅豆餅」，然後到張若女士父親張山鐘家裡作客。張山鐘畢業於日治時期臺北醫專，是屏東縣名醫，臺北醫專就是臺大醫學院的前身。張山鐘後來在金關丈夫指導下，完成了五篇有關屏東萬巒庄平埔族的手掌和腳掌紋、血液分析論文，兩人私交密切。張山鐘的愛女張若，畢業於高雄州立屏東高等女校，隨即北上進入



左圖
陳奇祿夫婦鶼鶼情深

右圖
1955年，陳奇祿與夫人合影。

臺北女子高等學校進修，住的地方離金關丈夫家很近，因此常到金關家聽音樂。

臺灣光復後，日本學校相繼關閉，張若的弟弟張豐緒（後來也做過屏東縣長、內政部長、體委會主委）當時打算前往上海聖約翰大學念書，當張豐緒向金關丈夫請教時，金關丈夫即安排陳奇祿和他們會晤，金關丈夫就說：陳奇祿怎麼怎麼好，人又很「漂撇」（瀟灑之意）！最後張豐緒上海沒去成，卻促成了陳奇祿和張若的婚姻。陳奇祿和張若經過約半年的交往，發現雙方都喜愛古典音樂，而張若的鋼琴彈得又好，兩人情投意合，千里良緣一線牽，大喜的日子還請到傅斯年校長證婚，從而建立了幸福美滿的家庭。

雖然陳奇祿辭去《公論報》工作，轉任臺大教職，但和國分直一合作繪製〈臺灣原住民族工藝圖譜插圖〉的工作，卻一直持續下去。陳奇祿畫插圖快速又準確，深受國分直一等人的喜愛。不過當時為《臺灣風土》和後來的《臺灣研究》撰稿的，還有地方志學者方豪（1910-1980），後來成為陳奇祿連襟的法學家戴炎輝（1909-1992），以及民俗

專家林衡道（1915-1997），他們成為開啟臺灣研究先河及卓越貢獻的學者，而陳奇祿卻是撰稿、畫插圖最多的，從而奠定了他不可替代的地位。

學術氣氛裡的大師身影

1949年是個大變動的年代，當時國民政府遷臺，許多公務員、學術界精英，諸如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李濟（1896-1979）、董作賓（1895-1963）、芮逸夫（1899-1991）等人都相繼抵達了臺灣。在考古人類學系成立之前，李濟、董作賓先是在歷史系任教；8月臺大考古人類學系成立後，陳奇祿和他負責的民族學標本，順理成章地一起轉到了考古人類學系。

陳奇祿雖然擔任助教，要負責許多行政上的業務，但他常排除困難，跟學生一起旁聽李濟所開的「人類學導論」，一聽就是七年，等陳奇祿從美國新墨西哥大學研究回國，才正式接下這個課程，當年他是個很認真的學生。

中國許多學者還沒有到臺灣來之前，就慕名臺大有一間民族學標本陳列室，主要是由於這間陳列室裡收藏了豐富的人類學標本的緣故。

提到陳列室的收藏，那是在日治時代臺大的講座成立之初就開始的，芮逸夫在〈本系標本搜藏簡史〉一文中提到，標本收藏經過有三個階段：一、是土俗人種學講座時期；二、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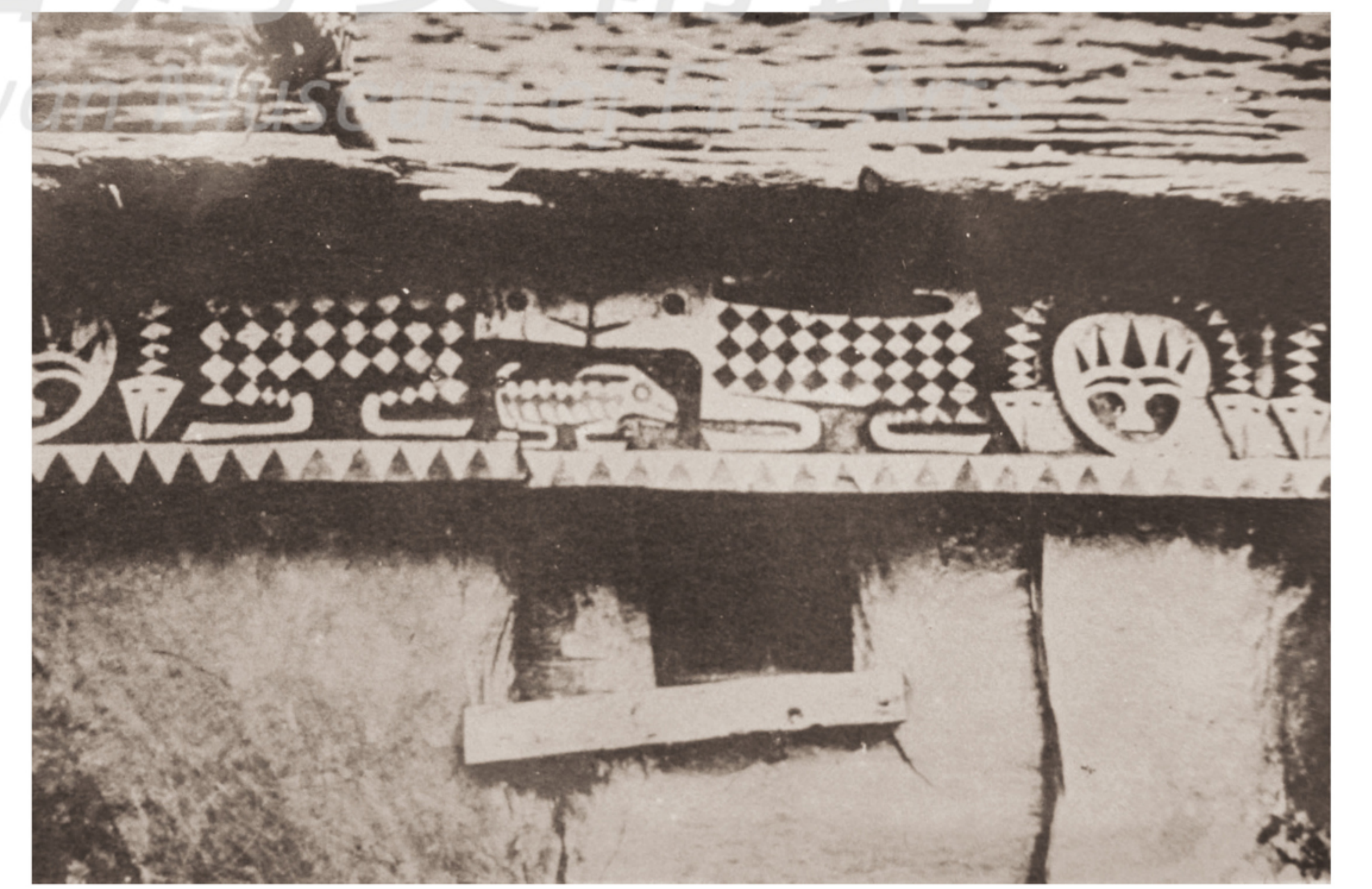
芮逸夫（右）身影



董作賓（右5）、李濟（右4）、石璋如（右2）等人攝於中央研究院楊梅倉庫前。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提供）

日人宮川次郎於1931年拍攝來義村排灣族房屋簷桁雕刻

學系民族學研究室時期；三、考古人類學系時期。第一個時期的標本主要是移川子之藏（1884-1947）在圓山貝塚採集的陶器和石器，約有百餘件；臺北帝大總長幣原坦氏贈送的排灣族飾物十件，蒐購的烏來泰雅族標本六十餘件；伊能嘉矩（1867-1925）搜集的平埔族和山地各族標本三百件。另外難得的是宮川次郎的排灣族標本兩百餘件，其中包括在屏東潮州附近的山區、海拔約1000公尺所發現的石雕祖先像，非常珍貴。雕像是砂岩質，岩體兩面分別刻有男、女像，為了收購搬運下山，還殺了五頭豬，用幾斗酒舉行祭祀後才搬下





1958年時的臺大考古人類學系標本陳列室，民族學部分。（陳奇祿提供）

11-2 臺大人類學博物館（現況）。（王庭玖攝）



來的，這就是所謂的「舊望嘉社」的雕像，殊為難得。其他還包括私人的捐贈品，一共達到兩千六百件之多，已頗具規模。還有海南島和南洋各島的標本約一千五百件，全是移川子之藏、馬淵東一（1909-1988）和宮本延人的收集和保存。不過在戰爭後期因臺北遭受到美軍大轟炸，這些標本也不免受到波及，受到一些損害。

臺灣光復後，臺灣大學直到考古人類學系成立之前，在陳紹馨先生主持期間，標本整理工作，最初是由當時留任的宮本延人和國分直一一起負責的。等考古人類學系成立，李濟任系主任時，標本管理工作就由陳奇祿和芮逸夫共同負責，隨後每年田野調查所收到的標本迭有增加，例如：1953年陳奇祿調查屏東縣霧臺鄉阿禮村的包幸吉頭目家時，就蒐集到高124公分的穀筒一件，堪稱是最優質的標本。

如前面所提，陳奇祿擔任《公論報》編輯時，就接替了立石鐵臣〈臺灣原住民族工藝圖譜〉的繪製工作；之前為了向立石鐵臣邀稿，常常要到臺大向他請益，等候他所畫的插圖，可是立石鐵臣往往要他等一下，說馬上就好；然後就點上一支接一支的香



11-1 國立臺灣大學《考古人類學刊》第4、11期的封面。

11-2 《考古人類學刊》收錄的陳奇祿、唐美君合著〈標本圖說——臺灣排灣羣族木彫標本圖錄（一）〉內頁。（陳奇祿提供）

菸抽起來，這樣一等就是幾個小時。陳奇祿就利用這段等待時間，到標本陳列室觀察標本和各類器物，如有疑問或感想會就近請教，他對這批標本的了解便漸漸深入，以致最後到達如



早年臺大考古人類學系標本陳列室東側一角，中間有圓頂的雕像即是「舊望嘉社」的雕像。（陳奇祿提供）

今日的臺大人類學博物館內一景（王庭玖攝）



1958-65年間，陳奇祿兼任臺灣省立博物館陳列部主任，1959年陳奇祿主任及標本製作者香洪與館藏泰雅族模型合影。

數家珍的地步。

其實陳奇祿對原住民標本的認知，是經過一段漫長的摸索過程的。幾年之後，他已從美國新墨西哥大學研究歸國，在系主任李濟批准下，就正式兼任臺灣省立博物館（簡稱省博）陳列部的業務，於是有更多的機會接觸到省博歷年的珍貴收藏，省博也很早就從事臺灣標本收藏，其蒐集品，除森丑之助（1877-1926）的收藏外，也有很不錯的南太平洋和海南島的文物收藏品。也就是因為這樣的緣故，使陳奇祿幾乎閱覽了臺灣當時學術機構所有的收藏品。

臺灣社會穩定下來之後，許多愛好原住民文物的民間人士，也收藏原住民文物了，像臺中張耀焜和臺北徐瀛洲等人，都有非常好的原住民文物收藏，陳奇祿也常到他們家中去研究，因此他對原住民手工製品和器物的了解，已到了舉足輕重的地位。1949年7月，因得到林氏學田經

【右頁下圖】森丑之助於1905年拍攝的排灣族巴武馬群瑪家社Baborogan-Lautsu頭目家及其前院，石板夾層頭骨陳列情形。



【左圖】霧臺鄉阿禮村頭目包幸吉家，高124公分的穀筒上的圖案。

【右圖】著傳統服裝的郡社群布農族男子。1906年森丑之助攝於今南投縣信義鄉。

費資助，促成了臺大第一次對臺灣原住民的田野調查。當時在臺大歷史系李濟、董作賓等人帶領下，陳紹馨任團長，前往南投瑞岩部落調查泰雅族的文物，隨行的還有芮逸夫、史語所的石璋如；省文獻會林衡立，以及何廷瑞、宋文薰和劉枝萬等先生。這次艱苦的田野調查讓陳奇祿印象最深的，就是董作賓吃了不少苦頭，因為不管怎麼說，董作賓就是不信任自己的腳，也不信任別人的腳，不敢過吊橋。

當時考古人類學成立未久，臺大為了培養人才，沈剛伯教授（1896-1977）推薦陳奇祿前往美國新墨西哥大學（University of New Mexico, Albuquerque）做研究，一年半之





1957年，陳奇祿參觀美國新墨西哥州聖塔菲（Santa Fe）原住民博物館。



陳奇祿在美國新墨西哥州試槍 1952年

後返臺。在1953年2月陳奇祿就升任講師。為了印證所學，就在這年5月梅雨季節到來前的枯水期，一個人迫不及待地去了屏東縣最深山的霧臺鄉霧臺村，和阿禮村從事田野調查。

在新墨西哥大學，陳奇祿當時跟隨會繪製精美地圖的萊斯立·史皮爾（Leslie Spier, 1893-1961）教授做研究，他是美國人類學之父佛朗茲·鮑亞士（Franz Boas, 1858-1942）少數弟子之一，而史皮爾的夫人教的是考古學，陳奇祿在她的課堂裡畫石器，畫的又快又好，一件件石器就像變魔術一樣從他腕底浮現，令周邊的人非常驚奇，因此他總是獲得很大的讚譽。另外系主任希路博士（Dr.W.W.Hillu），因為也兼任博物館的研究員，陳奇祿從他那裡學到許多博物館的知識。除了正常的課業外，他為了把握機會，凡是系上所開的課或是學術會議都盡量參加，成為學校中最努力、最活躍的留學生。

前面提到鮑亞士是個通才的人類學家，陳奇祿曾翻譯過史皮爾介紹鮑亞士在人類學貢獻的文



左圖
陳奇祿1951年攝於美國新墨西哥大學

右圖
1957年，陳奇祿在哈佛國際會議上演講。

章。他的《原始藝術》（*Primitive Art*, 1927）一書尤其著名，可謂是該學門的經典之著。這本書蒐羅了阿拉斯加針盒的裝飾圖文，在討論印第安人的裝飾藝術中，都輔以大量精美的插圖，使人不但一目了然，其精美的插圖也令人賞心悅目。陳奇祿深受啟蒙、對他影響很大。

這是陳奇祿一生中很重要的學術旅程，雖然為時只有一年半，但他的收獲卻是豐碩的。最後一次的在職進修已經是1963年的事了，這次是前往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做研究，大大增進其對非洲文化的認知，也更擴大了他的學術視野。由於受到國內和國外人類學大師的啟發，他除了密切接觸民族學的標本，把握住當時的有利條件，加上他原本對美術和工藝濃厚之興趣，自此就確立了臺灣研究和原住民木雕和織繡的研究方向。